

# 赵冬梅:宋朝复活,在她的声音中

## 对话

### 宋史研究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

读品:在您看来,宋代有哪些政治文化制度值得后世借鉴?

赵冬梅:太多了。陈寅恪先生说,“华夏民族之文明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,又说中华文化学术“将来所止之境,今固未敢断论。惟可一言蔽之曰,宋代学术之复兴,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。”宋朝制度政治文化的要义,简单地说,就是统治集团有底线、有理想,权力知道克制,故其政治能宽容、给自由,精英有思考力、担当精神和创造力。

读品:史学界有一个观点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,对此您怎么看?

赵冬梅:我不能同意,什么叫“无中国”呢?中国一直都在,而且还变大了,对吧?我更倾向于说,宋代以后,金元以降,中国发生了文化转型,在很多方面开了倒车。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以前,曾经出现过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文化的最好成绩,简单表述的话,应当是“有纠错机制的宽容政治”。但是,这种状态,到王安石变法就已经走下坡路,很多制度被破坏,政治上越来越专制,士大夫的话语空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。这种内在的恶化趋势,与来自北方的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,构成了金元明清政治文化的主调,国家治理的水平大幅滑坡,再也没有回到宋朝的水平。

读品:宋史研究为何要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?

赵冬梅:就宋代历史研究而言,它的国际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。传统上,中国人对于宋代的评价其实并不高,我们比较重视汉唐。对于宋朝的重新评价,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《唐宋变革论》把宋朝作为东洋近世的开端,就是说从宋朝起,中国进入了他的modern times。陈寅恪先生则认为,未来华夏文明的复兴,应该是带有宋朝元素的复兴。也就是说,重新评价宋朝,是20世纪以后海内外同时开始的。但是从50年代之后,海外和海内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,海外是继续发展,不断深入;但是大陆的宋史研究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。到了80年代,我们重新开始宋史研究的时候,海外学者其实已经拉下我们一大截,那这样你当然要去学。如果你现在让我评价,我会认为经过80年代到现在长时段的发展,海内外外的宋史研究,处在一个各有千秋、各有它领先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那我们当然要重视海外同行的研究,因为我们是在一起推进宋史研究的进步。



赵冬梅说,宋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很高,自然要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进展 本人供图

赵冬梅是研究宋史的,她向外国学生作自我介绍时,一般会告诉他们,她的赵和宋的赵是一个赵,他们往往会很配合地“恍然大悟”说:“啊,princess(公主)!”

今年7月,有网友在微博提出宋史专著《天潢贵胄》一书中,宋朝宗室赵令穰的名画《湖庄清夏图》被直译成了《清夏江乡图》。

赵冬梅正是这本书的译者。她没想到,一本十几年前翻译的作品,至今仍有人在关注、在讨论。“艺术史我当年确实毫无涉猎,也无如今日之海量电子资源可以凭借,错漏之处,必不止此两端,还请指出,是译者之荣幸,亦读者之佐助。”赵冬梅很快转发并回应了这条批评她的微博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## 1

赵冬梅与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结缘于2000年左右。

当时,一位前辈推荐她看看《天潢贵胄》这本书,认为值得译介过来。这是美国人写的一部宋代宗室史,赵冬梅看了,觉得题目很新颖,此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。

翻译不成问题,可翻译出来怎么出版呢?于是赵冬梅通过阎步克先生,找到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的主编刘东,径直说出了希望刘东能将这本书纳入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出版的想法。

当时赵冬梅刚刚博士毕业留校,没有翻译过一个字,发表的东西也非常少,但刘东非常爽快地答应了——“好,你译吧”。

《天潢贵胄》翻译到一半的时候,赵冬梅又看到了《中国转向内在》,并被作者刘子健先生行云流水般的思想迷住,于是她就先译出了《中国转向内在》,然后才把《天潢贵胄》译完。最后,这两本书都作为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中的一种,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出版。

《中国转向内在》一出版,研究宋史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,就把这本书当成是开给研究生的必读书。作为一部名著的译者,彼时的青年学者赵冬梅“也跟着沾光有名了”,“我出去开会,人就会介绍说,这是赵冬梅,这是《中国转向内在》的译者。就是她译的,译得很好。”

赵冬梅说,现在回想起来,这两本书对她写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。

比如《天潢贵胄》,谈的是宋朝宗室大家族319年间的历史。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宗室制度研究,还有社会史、文化史研究,所有这些专门研究,都被作者融入到了宗室三百年兴衰沉浮的故事中去。

“我后来做宋代人物的研究,做寇准、做司马光,是受这个的影响。我得承认,它是我作为一个译者得到的额外的好处。”

## 2

2012年,赵冬梅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《千秋是非话寇准》而被广大历史爱好者熟知。

观众形容她是“兼具优雅与知性的最美主讲人,因为她爱上

了历史”,地面讲座场场爆满,拥有千万粉丝。

不管是宋史学界的同行,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前辈、老师,反响也都非常的好。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:“论当代历史学者,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,赵冬梅当之无愧。历史在赵冬梅的声音中复活。”

感受到鼓舞的她,2013年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《司马光》。这一次,关于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的问题,甚至引发了一场民间大讨论。

上电视去讲历史,北大历史系,赵冬梅是第一位。

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女人要走到塔外边去的时候,通常会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适应。更何况是出身北大历史系这样“总体取向高深,与花花世界保持距离”的百年老系。

既要讲得通俗,又要保持历史学的尊严,赵冬梅深知“非常非常之难”,“但我为什么又去了呢?因为历史知识要分享。”

赵冬梅对自己的定位,第一是要讲“对”的东西,第二才是要“好听”。寇准的故事简单,比较容易好听。而讲司马光,有时候一整集都在讲司马光的一篇奏札,因为它重要。

虽然两次讲的都是历史人物,实际上,寇准和司马光,都是她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——寇准是北宋第一代政治家(打天下的那一代,赵冬梅称他们为“零代”),范仲淹是第二代,司马光、王安石是第三代,后面苏轼、蔡京是第四代……赵冬梅想通过不同代际的政治家的命运沉浮,呈现北宋政治文化的兴衰脉络。

所以,赵冬梅的寇准和司马光,讲的不是“一个人的故事”,她铺得很开,事件、制度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等等,尽可能立体呈现。

要得多,就做得慢。司马光的录制时间拖了四年多,在“百家讲坛”的历史上可能是最长的。

赵冬梅口中的宋朝是这样的:有一个可以商量的皇帝,不同的意见在朝堂上是可以共存、可以讨论的。而且宋代有批评的制度,有专门负责批评的官员,关键是它有一种包容意见的氛围。这是“好”的宋朝。

当然,宋朝的好,并非一切

人一切事一切时间都好。王安石变法之后,大宋走向了下坡路。“变坏了”的宋朝政治文化和来自北方的落后文化杂交,最终造成了近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样子。

“宋朝的好,在宋朝就已经走了下坡路。我唱的不是赞歌,也不能算挽歌,我想找寻的是变化轨迹,是背后原因。”这是她的大目标。

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,赵冬梅其实是赞美它的,但再赞美她也知道它仍然是帝制时代的一种宽容政治,它所有的根基是皇帝的宽容,当皇帝决心收回宽容的时候,那就谁也没有办法!

## 3

常常会有朋友抗议,说她把宋朝说得太好了。可她觉得,宋朝的好,说得还远远不够。

“毫不夸张地说,北宋是中国读书人最好的时代。赵宋家法,对于‘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’这一点有清醒认识。所以,你看寇准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苏轼这四代读书人,都是腰杆挺直、目光坚定。就连他们的业余生活,也是充满创造力的,美的,雅的。”

近代以来,中国人不喜欢宋朝,更喜欢那些强盛的、具有扩张力的朝代,比如汉,比如唐,甚至是蒙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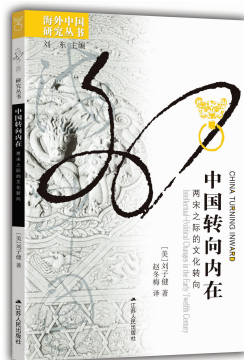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认识的产生,在赵冬梅看来,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屈辱得太久,需要心理补偿。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误解。包括学术界在内,对历史的了解过于片面,缺乏深入的研究。

“比如大家都觉得宋朝不能打,真的不能打吗?我自己研究过宋朝的军事管理制度,宋朝军队的管理肯定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。但是,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北南关系——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华夏帝国的关系,什么时候是南方一家说了算呢?只要北方是统一的草原帝国,南方基本上都很难抗衡。冷兵器时代,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,难!从这个意义上说,宋朝的战绩真不算坏。从世界范围看,抵御蒙古人时间最长的,就是宋朝。”

这个夏天,赵冬梅在“喜马拉雅FM”上开了一个声音节目“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”,讲中国的制度、文化和社会生活,就是希望把这些认识的盲区扫一扫。

## 赵冬梅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、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;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、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。2012年、2013年,登上央视《百家讲坛》栏目,讲述《千秋是非话寇准》《司马光》并出版相关图书。著有《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》《武道彷徨: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》等。



扫码看访谈视频

